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译丛

刘平 孙江 主编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

——一种传统的形成

〔加〕王大为 著

刘平 译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刘平 孙江 主编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译丛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

——一种传统的形成

〔加〕王大为 著 刘平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加)王大为著;
刘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译丛)
ISBN 978-7-100-05760-8

I. 兄… II. ①王… ②刘… III. 帮会—研究—中
国—近代 IV. D69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765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译丛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
——一种传统的形成
〔加〕王大为 著
刘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龙兴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760-8

2009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1/4

定价: 28.00元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译丛》总序

所谓秘密结社，顾名思义，指的是那些源流、构成、信仰和仪式等鲜为外部所知的组织，或是因法律明令禁止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产生和蔓延与中国社会结构内在的矛盾密切相关，其活动与社会变迁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因此，研究秘密结社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与文化等问题的认识。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叙述里，秘密结社的“反社会”、“反体制”的历史形象早已越出中国学学科的范围，而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中国常识，在这种常识里，秘密结社亦被称为秘密社会、地下社会，或是冠以邪教、黑社会等名目。但是，如何认识与区分秘密结社？人们的回答则不尽相同。一般认为，秘密结社指的是由摹拟亲属关系而形成的兄弟结拜型组织和师徒相传型组织，或是可以称之为被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所排斥的民间组织。前者在清代有天地会、哥老会之类的会党（所谓会党，即‘结会树党’之意），民国年间则以青帮、红帮等帮会闻名；师徒相传型结社主要指明清白莲教系统和罗教系统的宗教结社，民国后则有标榜道德拯救的新宗教结社红卍字会、宗教性武装结社红枪会以及种种名目的会道门。

毋庸赘言，不要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名目的秘密结社，即使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一名目的秘密结社之间都可能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把各种民间结社尽皆纳入秘密结社这一话语装置是否恰当，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而且，当与中国社会结构相关联的如此众多的民间结社被贴上秘密结社的标签后，接下来势必涉及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中国社会是什么？如何认识和叙述中国社会？以往的研究存在哪些缺陷？正是基于这些疑问，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往中国秘密结社研究进行全

面梳理,而翻译和了解海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收入本译丛的著作,主要以欧美和日本学界的研究为主,上起明清两朝,下及民国年间;不但有会党、帮会、民间宗教结社,还旁及秘密结社与政治社会变动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翻译著作,读者既能看到海外秘密结社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从而从学术史上对中外秘密结社研究加以总结,亦可以秘密结社研究为切入口,进而拓展中国社会史研究。

是为序。

孙江

2002年于日本名古屋

译者前言

“你在哈佛上过孔飞力老师的课吗?”“上过。”
“是‘清代文献’课程吧?”“是的。”
“他还在讲与钟人杰起义有关的奏折吗?”“对啊!”
“我那时也是上的这门课,太有启发了!”

2007年3月,我在结束为期一年半的哈佛访问学者项目回国后,在几个场合与台湾和大陆曾经在哈佛学习过的学者有过这样的对话。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在哈佛东亚系给研究生开的一门课程“清代文献”使众多学子受益,而王大为(David Ownby)作为孔老师1980年代初收入门下的博士研究生,长期经受“清代档案与文献”的训练,终于在1989年完成以清代档案为基础的博士论文——《18世纪中国东南的地方暴力》,^①是为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书的雏形。

王大为,美国田纳西州人氏,1979年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获历史与中文专业学士学位,1981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89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学位;其间,他于1981—82年作为高级进修生在南京大学学习,于1986—87年作为高级研究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

从哈佛毕业后,王大为先是在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任助教,后于1993年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 de Montréal)任教至今,现为蒙特利尔大学历史系教授兼

① David Ownby, *Communal Violence in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east China: The Background to the Lin Shuangwen Uprising of 1787*,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王大为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秘密社会,他曾与玛丽·索默斯·海杜(Mary Somers Heidhues)合编论文集《“秘密会党”新论——以近代华南与东南亚的社会史为视角》^①;1996年出版了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②;2003年,他和加拿大另外一位学者白素珊(Susan Palmer)与中国学者秦宝琦合作,出版了一本《千年王国与白阳世界——中外“末世论”载体的演化历程》(福建人民出版社);因为对中国1999年开启的“反邪教运动”十分关注(法轮功=秘密结社?),他不仅参加过中国政府组织的有关学术会议,也在海外广泛接触法轮功领袖与成员,历时多年,2008年初,他出版了一本颇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法轮功与中国的未来》一书。^③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于1996年出版后,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美国圣母大学的穆黛安(Dian Murray)教授这样评价道:作者“花费了很大功夫,把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富有启发性、挑战性和原创性。……这是一项大学生和专家们都会喜欢的标志性研究。”^④时在牛津大学工作的科大卫(David Faure)博士称:“总的来说,王大为写出了一本有价值的、档案征引丰富的有关天地会活动的著作。”^⑤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詹妮弗·贾伊(Jennifer W. Jay)教授认为:“王大为的著作不仅为秘密会党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更重要的是,它还记载着17、18世纪包括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及台湾等中

① “Secret Societies” reconsidered: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②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 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按,书名直译为《清代前、中期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全书着眼于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产生之关系及其对社会变迁(叛乱、械斗、移民等)的影响,故译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因“会党”本身出现于清代前、中期,我们在书名中不加时间限定词,对中文读者应该是容易理解的)。

③ *Falun Gong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④ Dian Murray, Book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6, No. 2. (May, 1997), pp. 488—489.

⑤ David Fa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8, No. 1. (Jun., 1998), p. 272.

国东南地区的社会历史。”^①

2004年,当我还在组织商务印书馆“中国秘密社会译丛”的稿源时,曾经征求过孔飞力老师的意见,他说王大为的这本书和《“秘密会党”新论》都值得入选。最终,我们选择了王大为这本专著。

既然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广大读者,那么,我们也有必要把其中的基本结构、主要观点,尤其是存在的值得商榷的问题作些介绍。如此,我们的工作也就不仅仅停留在为翻译而翻译的水平上了。

本书主体框架如下:

导论、鸦片战争前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主要讲述了“相关主题的学术史”、“地理与历史背景”、“文献资料情况”与“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林爽文起义时期东南地区的兄弟结拜组织。作者对清前期结拜组织之源流、会社仪式与虚拟兄弟关系中的歃血盟誓、18世纪东南地区的结拜组织与林爽文起义等内容进行了梳理。

第二章,结拜、会党与叛乱:林爽文起义的背景。作者对天地会的创立、向台湾流传及其与林爽文起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会党叛乱与无会党叛乱:朱一贵起义与林爽文起义之比较。

第四章,秘密会党与民间宗教。本章对林爽文起义失败后政府追查、搜捕天地会以及天地会的蔓延做了精致的阐述,并对天地会与民间宗教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分析。

第五章,边缘性与思想性:清朝针对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立场。作者主要是从清朝律例中有关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条款展开分析的,同时,作者把研究主题与东南地区常见的械斗情形进行了对比。

第六章,结拜组织与晚期中华帝国。实际上是一个概括性、宏观性的结语。

天地会的起源、性质、传播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是国内学术界

① Jennifer W. Jay, Book Review,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XXXII, (Aug. 1997).

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大为以丰富的档案为基础,以林爽文起义为平台,对这一问题作了新的诠释。下面对该书一些重要的观点作些介绍。

王大为发现,尽管很久以来兄弟结拜与歃血盟誓就是中国社会习俗的组成部分,但是,成群的男人通过歃血盟誓的方式聚集一堆,自称“会”的情况在17和18世纪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尤其是在东南地区(前言第7页,此处用英文版页码,中译本有英文版页码对照,下同)。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因改朝换代引起的战争及18世纪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在诸因素中,这两点尤其重要)足以将数量众多的男人——尤其是青年男人——从家族及乡村生活中驱往社会边缘”(第3页)。这一问题牵涉天地会起源的背景问题。天地会起源众说纷纭,目前主要集中于“康熙十三年说”和“乾隆二十六年说”。^①王大为倾向于后者,并从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的角度对兄弟结拜与歃血盟誓的历史做了很好的梳理。^②

国内虽然曾经有学者对林爽文起义与天地会传播的关系做过研究,但王大为在这一问题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比较清晰的天地会传播路线图。他说,清政府不仅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扑灭林爽文叛乱,而且花了大力气追究天地会的起源。在18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看到了一场清政府与结拜组织之间发生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绵延不绝的对抗:缉捕、叛乱和死刑充斥于乾隆末年和嘉庆初年。10年对抗的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便是,秘密会党的会首从东南沿海地区天地会的发源地逃离。最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南中国内陆地区寻求避难,将天地会的因子传播至江西、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另

① 前者因重视对天地会会内文献的分析而被称为“索隐派”,以赫治清、胡珠生为代表,参见赫著:《天地会起源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胡著:《清代洪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后者因重视清朝政府对天地会的追查档案而被称为“档案派”,以蔡少卿、秦宝琦为代表,参见蔡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秦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② 他在后来更明确提出:“如果把天地会定义为自立天地会为名,具有特定的传统入会仪式、暗语、手势的那种组织,它颇有可能是乾隆年间创建的。”见〔加〕王大为著,曹新宇译:《一个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看法》,《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4页。

一些人则随着不断高涨的移民浪潮到了东南亚,同样的动因将中国秘密会党带到了欧美各地的唐人街(第5页)。天地会研究尽管一度很热门,但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其起源、性质等问题,对于其如何传播、如何从一个地方性会社演变为一个国际性组织缺乏深度分析。王大为的论述富有启发。当然,我曾经考虑过但未曾着笔的一个问题是:天地会的传播应该与客家人有较大关系,因为在林爽文起义被镇压之后,尤其是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的传播主要集中于闽粤赣客家人聚集之地,尤其是闽西赣南;在突破这一地区之后,天地会的传播就不受任何约束了。

关于天地会的性质,“康熙十三年说”的学者坚持其“反清复明”思想乃是天地会基本性质的观点,“乾隆二十六年说”的学者则坚持“互助抗暴”的观点(也许“互助一抢劫”更客观一些)。王大为发现,尽管天地会创立者为本组织的入会仪式涂上了启示性色彩,发明一套独特的隐语、誓词,但林爽文及其天地会会众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即便在反清暴力加速酝酿之时也是如此。这一点肯定表明了过分强调会党成员政治意图的危险(第81页)。林爽文起义时,其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反清复明”,通行的口号是“顺天行道”、“剿除贪官,以保民生”之类。乾隆六十年,陈周全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以“争天夺国”为口号,也没有提及“反清复明”。

如此,深入探讨乾隆年间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或许可以找到答案。王大为发现:“叛乱中的许多暴力都是漳人与泉籍(以及人数较少的客家)义民之间的仇杀。从这个意义上讲,分类集团间的仇视乃是关系到叛乱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没有这种仇视的动员作用,林爽文就无法发起全岛性叛乱;没有同样是被动员起来的义民的协助,清朝镇压林爽文叛乱者的战事将会延长许久”(第90页),所以,“对整个事件的绝大多数参加者而言,这场起义的械斗性质远过于叛乱性质,由此不难看出,族群集团的分类,比起天地会来,是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中枢”(第93页)。确实,由于贫困和东南地区来来往往的移民问题,台湾出现了一大批流离失所而被兄弟结拜组织和秘密会党接纳的单身汉(“罗汉

脚”),形成一种单身汉亚文化群。王大为断言,在支持或者反对起义的态度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组织核心”(axis of organization)是族群认同,而非天地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起义的失败部分可归因于清政府招募了与起义者相对立的族群成员。^①

所谓“族群认同”与“族群冲突”,在清代台湾称为“分类械斗”,其表现有异籍斗、同籍斗、异姓斗、同姓斗等形式,其中尤以异籍斗中之漳泉械斗、闽粤械斗为著。姚莹称:“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众辄数十万计。匪类相聚,至千百人,则足以为乱”。^②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分类械斗”是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台湾的社会动乱以及每次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义民”则是某个或数个移民集团站在政府立场上对发动社会动乱或起义的移民集团实施“分类”报复的组织。^③“义民”角色在每次起义中随着起义领导者的祖籍身份而变换,所以,以往人们轻易把“义民”称为地主武装是很不恰当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天地会是一个单一名称,但在林爽文起义之后的数十年间,天地会的变名多达数十种;进一步而言,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天地会也有不同的表现,后者乃是王大为在书中带给我们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他分析道,当天地会从原产地流传开来时,它染上了越来越多的地方色彩,而非始终都是叛乱成性的。在台湾,紧接在林爽文起义之后,天地会确实扮演了一个叛乱载体的角色,同时,在东南内地也发生了一些类似叛乱。在广东,绝大多数天地会都从事犯罪活动,主要是抢劫与盗匪活动。在闽西—赣东地区,天地会与各种形式的民间宗教相混合,实际上成为一个传播宗教习俗的工具(第106页)。

在闽西—赣东地区,“暴力性的天地会”与“宗教性的天地会”并存,这种情形再次吸引我们注意到天地会身上的“民间”意义,特别是面对

^① Jennifer W. Jay, Book Review,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XXXII, (Aug. 1997).

^② 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625—626页。

^③ 刘平:《林爽文起义原因新论》,《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清政府持久而残酷的镇压,非叛乱性的天地会仍四处流传。闽西和赣东地区天地会传播的情形证明,宗教因素是那些地区天地会成员信仰的核心,“这些宗教因素很容易与歃血盟誓和启示性叛乱思想共存(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前者还吸收后者的内容),它们也有助于说明那些至多不过是寻求互助的团体为何要利用那些肯定会激起清政府愤怒的仪式与信条”(第106—107页)。不仅如此,王大为还把天地会仪式上的器物与当代台湾某些道教仪式的器物加以比对,以说明当地天地会的宗教性质。对此,穆黛安认为:“人们迄今一直忽视了天地会的这些内容”。^①当然,如果作者能进一步研究“天地会与白莲教(民间宗教)互相融合”的问题的话,势必能发现更多有趣的东西,比如青莲教衍生一贯道、天地会与青莲教融合产生哥老会等问题。

在将清政府针对结拜组织和械斗的态度进行一番比较后,王大为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结拜组织和械斗团体都是暴力性的,其暴力都由同样的边缘分子所促成,“然而,在总体上,无论它们之间多么相象,与对待械斗团体比较起来,清朝官员对待结拜组织的态度可是严厉得多。”清政府盯住结拜组织不放是有重要原因的。结拜组织——分散的、流动的、有时与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秩序是相脱离的——游离于等级制度之外,而等级制度正是清政府看待并统治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的工具(第177—178页)。这种观点不仅影响了清政府,即使后来的政府,也是着眼于处置社会动乱(叛乱),而忽略造成社会动乱的因素(尤其是械斗)。

最终,王大为得出结论:“林爽文起义可被视为中国结拜组织历史的分水岭。在林爽文起义之前,简单的结拜、立有名目的结拜和秘密会党都开始迅速增加,并不时引起清廷的敌意,但是林爽文起义在清朝官员和普通民众的脑子里则完全确立了会党是一支强有力的力量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患上偏执狂的清政府从一种非正式的习俗中造就了一支反对力量,对政府权力来说,不无讥讽”(第180页)。这

^① Dian Murr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6, No. 2. (May, 1997), p. 488.

支力量在后来的暴力活动中越来越多地涂上“反清复明”的色彩,并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着实出了一把力。

中国秘密社会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深奥领域,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王大为做得非常不错,把相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毋庸讳言,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第一,主题的模糊性。作者全书论述的主线是“简单的结拜——立有名目的结拜(“兄弟结拜”或“异性结拜”)——秘密会党——叛乱(林爽文起义与朱一贵起义)。严格说来,“立有名目的结拜”就是清朝政府所关注的民间的“结会树党”,即“会党”。如此,书名中的副标题“一种传统的形成”指的是什么意思就令人费解了——是“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还是“秘密会党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呢?

而且,作者谈到,天地会从东南地区南方各省蔓延、“转变成为一种组织——它构成了19和20世纪许多中国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06页)。那么,天地会是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种传统急剧蔓延的呢?作为一个组织,人们看到的天地会是一种结构、决策程序和机械装置,各“房”之间得以从中获得信息。作为一种传统,人们会想到仪式与信条的传播,包括相信无所不在的天地会的存在——无论天地会作为一个组织是否真实,“我想,王大为写的是‘组织’,但他经常指的是‘传统’”。^①

第二,论述的模糊性。受上述情况影响,作者在论述中多有模糊之处,例如,他说:“林爽文天地会与立有会名的兄弟结拜之间的这种联系非常重要,……有关林爽文天地会的其他内容表明,与其说它是会党,还不如说它更像一种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第64页)。把会党与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混同的叙述在书中多有出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又如:“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结拜组织,而非叛乱,尽管为了了解这些组织必

^① David Fa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8, No. 1. (Jun., 1998), pp. 270—271.

须对叛乱加以研究。……我们得知,结拜组织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可以随意解释的东西,这两次叛乱更应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而非兄弟结拜或是秘密会党的组织能力或是信仰力量”(第103—104页)。从全书的情况来看,作者把这两次叛乱“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传统?)基本没有展开论证,人们看到的是兄弟结拜与两次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朱一贵依靠的是一般的兄弟结拜,而林爽文依靠的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

王大为一方面认为加入天地会者都是生存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但另一方面又用统计方法对会党成员的供词开展研究,说明这些人“有家口,有宗族,有赖以生活的村社”,而且,林爽文本人就不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无赖”(第70页)。其说自相矛盾。王大为认为,清政府对天地会的镇压,有助于后者向整个华南、华中地区的传播。那些逃离闽台的会党分子在所到之处,又重立新会。原书第129页的附图显示了这一地理流传方式,颇有说服力,但原书第130页的统计数字又说,闽粤地区60%的天地会组织是本地人创立的。这是作者必须加以解释的。^①

第三,王著在结构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第六章“中国结拜组织与晚期中华帝国”仅用了区区5页。作者的原意是,在这一章里,“将前面各章所述材料和观点放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实际上,由于篇幅所限,作者的目的并未达到——至少有三点,一是缺乏对结拜组织或会党在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活动特征的宏观性总结,即它们对内互助、对外犯罪与反清斗争的关系;二是会党的政治性、破坏性是如何被后来的政治团体所利用的(包括会党是如何沦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三是作者在本章用了一半的篇幅描述东南亚华人会党的情况,也许超越了本章主题。或许,把本章作为“结语”更为合理一些。

第四,王著在行文中还存在一些史料与术语方面的错误;在书后的“注释”(原为统一尾注,现一并改为脚注)与“征引资料篇目简介”中,或

^① 刘平:《对〈“清代早、中期会党与秘密社会”评价〉的评价》,《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许由于校对的原因,存在较多的人名、地名、文献名称等方面的翻译错误,我在翻译中已经一一更正,或是以“译者按”的方式加以说明。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是在1999年下半年进行的,至今已经9年,其间多有变故。2006年6月,在哈佛燕京学社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从蒙特利尔赶到波士顿开会的王大为问我:“中译本出版了吗?”我说:“快了。”不觉又是两年过去。今天,真的“快了”,也算是对作者、对读者的一个交待吧!

刘 平

2008年7月12日,山东大学

中译本前言

针对本书主题的研究开始于 20 年前。从那时起,中国的地方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近乎革命性的变化。当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清史方面最重要的一门课程是由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讲授的“清代文献”。我们当时主要学习如何查找、阅读并分析那些清代档案。在当时,这些档案已经开始对外国学者开放,这是中国越来越走向开放的一项举措(对外开放是由邓小平在后毛泽东时代初期提出来的)。我们当时以为自己走在学术的最前沿,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对外开放的程度会有这么大,也没有意识到中国史学家们的变化速度会有这么快,他们不再沿用毛泽东时代的研究和叙事方法,相反,他们开始了与外国学者之间的真正合作。如果我是在今天着手研究清朝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课题的话,我可能会首先去寻找研究类似课题的中国学者,他们可以协助我开展在福建、广东及台湾地区的田野调查和地方史研究。在课题研究的第二阶段,我才会去查阅档案资料。实际上,荷兰汉学家田海(Barend ter Haar)有关三合会(天地会)的著作《三合会的仪式与神话》(*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1998)就没有仅仅依靠档案资料,更多的是依据地方材料;同样,他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也比我的研究更为深入。

就更为广阔的层面而言,我写《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这本书的目标是想把这些社会群体放入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而不是拿着族群与民族主义的东西说事,这些东西虽然从一开始就影响着中国(以及其他地区)对于秘密会党历史的书写,但我认为,这些文字更多地探讨了 20 世纪的国家政治,而对于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中国东南乡村地区的社会现实却涉及不多。写这本书的目的,我自己认为已

经基本达到,而且我也高兴地发现,海内外对于明清地方史研究的意见也开始趋于相同。丁荷生(Kenneth Dean)与郑振满对福建民间宗教史的研究,宋怡明(Michael Szonyi)对福州地区的家族与仪式的研究,尤其是科大卫(David Faure)的珠江三角洲研究——突出表现在其新作《皇帝与祖先》(*Emperor and Ancestor*, 2007)一书——这些作者及其研究采用了地方材料(以及某些官方材料)来分析研究形成中华帝国晚期历程——不可避免地还包括中国的现代历程——的地方与国家的冲突。这些成就如果不是绝大部分、也是大部分建立在与中国学者的合作之上的,如此,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美两国的学术分野就小了很多,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我在中国做研究时,这一分野却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本书的中国读者会发现,书中所描述的秘密会党并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不像功夫片里的表演,也不像小说里描写的上海青帮,更不像当今报纸登载的跨国毒品交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出神入化、富有传奇色彩的秘密会党,实际上是早期全球化浪潮的后来产物——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使中国沿海地区接触到了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贸易模式,推动了中国东南地区民众前往东南亚的移民浪潮,建立起毒品与人口(以及其他诸多买卖)的商业网络。在中国本土已经被边缘化的秘密会党开始满脸喜色地在由殖民地与移民潮共同构建的新世界(或者说是新的地下社会)担当起领袖的角色。然而,在观察兄弟结拜和秘密会党不断增生的原因时,也使我们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灵活性,以及秘密会党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对即兴创作与实践方面(improvis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的开放性。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论主流社会秩序的压力多么强大,比如什么“儒家家族社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甚至什么“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总是会有与主流方向相抗衡的社会逆流——不论是好是坏——的存在。

王大为(David Ownby)

2007年7月

于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 de Montréal)